

严小龙◎著

“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Two-return Nurture” and
New Socialism
Rural Reconstruc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丛书

“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

“Two-return Nurture” and
New Socialism
Rural Reconstruction

严小龙◎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严小龙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0456 - 1

I. 两… II. 严… III. 农村 - 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782 号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丛书 ·

“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著 者 / 严小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刘德顺

责任编辑 / 刘德顺

责任校对 / 高 崇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7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56 - 1/F · 0162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一个未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古老而落后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以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落后，又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极为匮乏所导致的国力衰微。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考验。

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了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样，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本就落后、贫困、萧条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条主线。

既要推进城市工业化，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这在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着实是一个两难兼顾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而且，“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因此，“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总之，“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可见，囿于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以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说至少有三点是清楚的：一是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农业要支持工业，农村要支持城市；二是在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上，要以苏联为鉴，强调统筹兼顾、平衡发展，目的是为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三是经济建设要服从政权巩固，巩固政权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以此出发，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或许说在后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工作重点就一直在经济建设与政权巩固这两者间摇摆，并且始终围绕着政权的巩固来进行，而这一切又缘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以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偏离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重新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为城市的改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我国在1990年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也就是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到2000年又实现了第二步，即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总体上达到了小平同志所期望的小康水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开始了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进军的新征程。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个敏感点，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理性思考。一些学者结合国际经验认为，一个国家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之后，未来可能会有两种前途或结果：一种是“跃起腾飞”，跻身于现代化强国之列，另一种则是“盘桓不前”，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中求索。

的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走向深

入，各种由于发展而诱发的矛盾、问题逐渐暴露和显现出来，如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公平、正义问题等，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们对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焦虑和思考。就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而言，与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日新月异相比，一些农村确实显得过于破败和萧条，农民依法抗争、暴力围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人甚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悲壮进言，“三农”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仅仅指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也应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在何时开始建设新农村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在1958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马上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比1970年韩国开始的新村运动要早得多。这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把推进工业化与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新农村看成是一种统筹发展的关系，虽然明确经济建设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为中心，强调农业、农村对工业和城市的支持作用，但并非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要等到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之后才开始关注农业，也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工业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看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的失误在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出了问题，从经济建设转向政治斗争。回顾历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总结和深思。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党不仅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的方针，而且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数量扩张的任务，告别了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来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局面，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理论和实践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作者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中外理论，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置于一个相当宽广的理论、方法下加以考察，在方法上有所突破，也有助于观点的创新。在选题方面，把党和政府提出不久的战略思想和举措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转换尤为不易；在观察视角方面，论文从“两个反哺”的大视野出发，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新意，也是不多见的；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外比较、历史与现实交叉、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各种研究方法，在文中都有着较好的体现；在内容方面，该文以一个较大规模的农民意愿问卷调查作为新时期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民意基础，特色较为突出，也富有原创性；在资料引证方面，该文也比较丰富和翔实，因而对有的问题的分析较为准确和透彻，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具体来讲，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①国际与国内相结合，而以国内为主；②时间构架和空间构架相结合，而以空间构架为主；③历史与理论相结合，而以理论为主；④民意基础和建设战略相结合，而以建设战略为主；⑤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而以一般为主。在这辩证综合的过程中，作者基本抓住了科学与价值、批判（反思）与建设、国际与国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展开论述。

总之，该著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前沿性，研究的难度和工作量都比较大，正因为如此，缺陷和疏漏在所难免。但作者在详细论证“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方面，以及对如何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做出的可贵探索则是值得肯定的，反映出作者为学术研究所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希望作者再接再厉，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是以为序！

刘湘溶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2008.2.10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选题缘由、概念与背景	1
二 理论基础、方法与框架	18
三 研究目的、价值与概要	36
第二章 理论建构：“两个反哺”与新农村建设问题	49
一 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两个反哺”的发生机理	49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重提的理论意涵	65
三 “两个反哺”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十大关系	80
第三章 比较研究：境外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	97
一 利益整合与欧美国家反哺农业的特色	97
二 政府主导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建设	113
三 贫富分化与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	127
第四章 时间构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农村建设的历史脉络	142
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历程 ..	142
二 改革开放后至 1990 年代初期的繁荣局面	159
三 1990 年代初期以来面临的现实挑战	174

第五章 空间架构：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特征	194
一 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	194
二 当代农村社会的区域结构特征	214
三 当代城乡社区的差异结构特征	231
第六章 整体推进：反哺时代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	249
一 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民意基础 ——以湖南农民意愿调查为例	249
二 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大政方针	269
三 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推进方略	283
四 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施政创新	302
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28

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缘由、概念与背景

（一）选题缘由

自从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苍凉的大地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始终面临着一个十分艰巨、复杂而又历久弥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从借鉴、扬弃苏联模式，到确立走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建设路径的逐步明晰化、战略化、具体化，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求真、务实、为民的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到底的气概和精神！从这种艰苦卓绝、大气磅礴、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大可以领略到历史的无限风光，以及从中获取现实启迪的希望曙光。^①

诚然，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但“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绝不能离开现代化，绝不能脱离时代发展的潮流，来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因此，综观目前局势，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在一个发展还很不平衡、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例的大国，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

^① 李屏南：《选择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观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第81页。

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基础和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如何才能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统一？一句话：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最大的“民”——农民问题，以及围绕农民问题派生出来的农业、农村问题。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理论决定着我们能观察的问题。”^① 以此而论，如果总是把视野局限在农村社会，在古老的耕作方式和落后的小农意识中寻找办法，这个问题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而且，这已为大多数已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所证实。欧美大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无不是在新兴的工业文明与势力强大的农业文明之间的较量、磨合、斗争甚至战争中，最终以工业文明取得统治地位，然后依靠工业文明的深化和扩散将农业文明纳入其中，进而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以农业兴起为标志的“这个伟大的第一次浪潮，基本上已消逝殆尽了”^②。亚洲一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则向人们展示了另外一番图景，特别是韩国于19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就是在国家工业化具备一定基础之后，在政府主导下，整合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有意识地开展的一项社会建设事业。事实表明，韩国新村运动，对其后来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历史的另一面同样也不可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示范下，步入了发展主义的轨道。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发现，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如韩国这样的小国和中国台湾这样的地区取得成功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努力都以惨败而告终。与此同时，过去的价值和认同被撕成碎片，未来的轮廓和面貌依旧难以辨认，社会结构和秩序正在或面临解体，如拉美和南亚的两极分化、非洲的贫困与苦难、伊斯兰宗教运动的复兴、世界范围内犯罪经济的猖獗，等等。而众多

① 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铧、王宏周、魏章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8页。

②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1984，第60页。

原因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发展中，日益断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城乡差异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弥补而导致最终的瓦解。

透过历史经验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已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处于西方还是东方、先发还是后发、大国还是小国，无不是在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之后，高举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大旗，通过各种方式、采取各种手段，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来促进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农业、农村、农民的产业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直到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这些国家还保持着这种传统的做法并不断对其加以创新，例如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黄箱”、“绿箱”^①支农政策。

显然，这里隐含了三个重要的前提假设。第一，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跟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因而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关注。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能提供基本生存资源的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第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积累了相当的实力，能够对农业、农村提供反哺支持。因此，在第一、第二点形成的社会紧张中，就必然要达成某种妥协或均衡，易言之，在效率与公平、经济与福利、利益与价值之间需要做出某种取舍，显然，第三点则是达到上述均衡的必要条件。

总体来讲，与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历程相比较，目前中国向人们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图式^②。有一位外国大

① “黄箱政策”，即受 WTO 约束和限制的农业支持与补贴，主要指价格补贴政策；“绿箱政策”，即符合 WTO 农业协定 6.1 条款规定，其执行不增加消费者负担，不具有给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作用的补贴措施，主要指非价格补贴政策。参见华元渝、陈舒泛《走进 WTO 农业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 10~12 页。

② 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勾画了社会发展的两大图式。第一种图式的基础是一个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以及一个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而第二种图式的基础则是一个“新”中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学术界在 20 世纪上半叶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本文在这里只是对一种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的借用，表明社会发展的轨道不是单边的，而是多样性的。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第 58、67 页。

使回国后，记者采访他对中国的印象，他的回答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实际上，就当今中国社会的情况而言，用“欧洲+亚洲+非洲”这种图式来表述，也许更为贴切。因为正好与上述图式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断裂”为三个相对完整的部分（如果按发展程度来区分，用比较夸张的语言来形容）：先进的以知识创新和信息处理为中心的信息社会；发达的以现代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社会；落后的以传统的农耕经济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历史上的三种主要社会形态，都容纳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之中。

2001年，托夫勒在中国访问时，也将中国分成“三个世界”：一是“第一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这个世界是九亿农民，他们生活在农村，在当今社会里，他们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二是“第二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人口总数约三亿，他们生活在城镇，属于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三是“第三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这部分人口比较少，约千万人，他们是信息时代的人口。^①可见，我国的农村和农民基本上还是处于农业化的浪潮中，离工业化和信息化还有很大的差距。

因而，在这种社会发展格局下，如何将工业主义、信息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发展取向融合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是我们，也是当今人类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面对这种社会结构状态，如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加以整合并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特别是将落后农业社会的载体——农村社会加以扬弃和改造，使之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之中，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而且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

在当前，通过学习体会中央一系列会议的方针和精神，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是，目前我们党和政府所重视和强调的农村工作，与过去相比，其重点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关注的焦点主要是

^① 阿尔温·托夫勒：《托夫勒的中国预言》，2002年12月9日《科学时报》。

农业问题，即粮食产量问题；而现在强调的则是以农民为中心的“三农”综合发展问题，即如何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视野出发，通过实行“两个反哺”^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与身份转换，破除阻碍城乡融合的政策和制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从而达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转型的问题。

为此，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在学理性思考和经验性体会的矛盾纠缠中，在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一脉相承逻辑理念的直接启迪下，我把本书的题目定为：“两个反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概念辨析

1. 农民、农业、农村与“三农”

农民，是对一种古老职业的传统称谓。这种传统痕迹，突出体现在旧式农民的“黏土性”上：世态定居是常态，而迁移则是变态，即便是迁徙，也“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②。而且，目前它还具有一种社会学含义，似乎指一种身份符号，一种越来越掉入社会底层的身份象征。总之，他们构成了我国人口比例最大、最为分散、也最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群体。

农业，“是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生产对象，以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交织为特点的物质生产部门”^③。在当代中国，它不仅是大多数农民赖以谋生、生存、发展的行业，而且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生存资源的产业，因而农业的稳定状态，

① 中央正式的提法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而学术界在讨论时常常使用“两个反哺”的说法。笔者认为，支持一词本身带有“反哺”的意思，而且历史也表明，城市和工业同样都是在农村和农业的哺育下成长壮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把“城市支持农村”称之为“城市反哺农村”应该也是适宜的。因此，从精炼、概括的角度出发，同时借鉴学术界的一般说法，本文将其称之为“两个反哺”。——作者注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第3页。

③ 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页。

构成了整个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

农村,不仅指一个特定的居住地域概念,更是指一个复杂的社区综合系统,是一个集生态、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于一身的综合实体。美国学者 R. 比勒尔等认为,“农村”一词至少有三种各自独立的含义,即:①生态方面的;②行业方面的;③社会文化方面的。^①由此可见,农村的概念是宽泛的,其中自然涵盖了农民与农业的内容。

显然,这三者之间既有着各自独立的含义,也有着相互牵连的关系,而将这三者统为一体来讲,就成了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三农”^②。这个概念,是中国学者针对 1980 年代末以来农村社会出现的发展迟缓现象,特别是在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的对比中,逐步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表述方式,同时也是作为认识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而提出的。其工具意义表现在:作为对农村问题的分解,既可以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研究它们各自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并没有“三农”这一说法,而只有分别的论述,应该说,“三农”理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理论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成果。^③

2. “两个反哺”与统筹城乡发展

反哺,据《春秋运斗枢》记载:“飞翔羽翮为阳,阳气仁,故乌反哺也。”《本草纲目·禽部》也有记载,“慈鸟: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总之,这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语境,是描述一种鸟类的行为:雏鸟长大,衔食哺其母。以此借喻,把扶持农业、农村,称为反哺农业、农村,是很贴切和形象的。

① R. D. 罗得菲尔德等:《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第312~313页。

② 古之三农,旱农、泽农、山农之谓也。——作者注

③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前言第1页。

“两个反哺”，是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主要是讲在国家工业化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应调整工农、城乡关系，改变过去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援助城市，鼓励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政策和制度，而反过来形成一种良性运行的“反哺”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发育，使其跟上全社会发展的步伐。

进一步说，工业反哺农业，实行以工促农，并不是让工业企业直接去支持农业，而主要是指通过恰当的政策，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城市反哺农村，实行以城带乡，就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支持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其核心内容就是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集中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

统筹城乡发展，总的来讲，就是要跳出就农村建设抓农村建设的旧思路，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建设机制。不仅要彻底打破现存的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局面，而且在新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出台上，要从全局和战略的角度出发，有意识地向“三农”倾斜。

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新”在何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57年10月26日，党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①这应该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概念。其“新”意，主要是针对旧中国千疮百孔、破败萧条的农村而言，表明我国已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当时是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饭前葡萄酒、饭后水果糖”来描绘新农村的前景的。^②以后搞人民公社化、普及大寨县，也是想要建设新农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也都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

^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② 沈宝详：《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新农村建设》，《学习时报》2006年第329期。

号，并将其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以及在总体上已进入“两个反哺”阶段，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正像2005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描述的那样：“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提出这个战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尽快改变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以促进整个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和谐转型。

概括地说，当前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下，在我国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前提下，在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推出的一项全面推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从而也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伟大实践的庄严一幕。

那么，现在讲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弄清的思想认识区域。对此，一个时期以来，各种认识、言论铺天盖地，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里仅以几位知名学者的看法为例，以窥全豹。

温铁军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一，“新”在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更关注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其二，“新”在农村的发展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重在农村社会相关制度建设。其三，“新”在农村发展的同时仍然保持田园风光，是自然人文环境令人耳目一新的良好生态型社会。^①

^① 周清印：《新农村建设：中南海谋划“三农”的一张新路线图》，参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899232.html>。